

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的危机与局限

李 侠, 邢润川

(山西大学 科技哲学研究中心,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 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化后将会对文化多元性的存在产生巨大的破坏,以及造成话语霸权的普遍规训作用,将对社会生活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对于如何理解科学主义以及如何看待科学,在我国当前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危机与局限

中图分类号 J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J1002 - 1698(2003) - 02 - 0047 - 10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一切传统的界限和疆域正在被打破,在这期间科学的社会功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正在以无形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它不仅影响到我们的生存环境,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它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思维方式,科学已由最初的改造自然的手段,日益演化为人类的主宰,使人类真正面临被客体化的危险。当前,流行正盛的科学主义思潮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其中,最为令人担忧的是在科学主义泛化的今天,它有被人为地抬高到意识形态的趋势,如何分析这种情况可能产生的后果与局限,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问题在我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它也就成了一个被悬置的异域。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如马尔库塞等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如哈贝马斯并不完全赞同马尔库塞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的社会文化发展模式,从一开始就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因素是人类

作者简介:李侠(1967—),山西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邢润川(1940—),山西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博导、教授,《科学技术与辩证法》杂志主编。

对自身生存的外部条件的日益增长的技术的支配权;另一个因素是制度框架对目的理性活动的扩大了的系统不同程度的被动适应。”^[1]如何在制度框架的被动适应与目的理性的主动适应之间的不协调状态中,揭示出问题的本质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对于这个问题的梳理在当前就具有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因为它事关科学在我国今后的发展前景问题。

一、科学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为了阐明科学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首先,我们要把意识形态的概念作一些梳理和界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进入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域。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个概念最早是由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哲学家特拉西(Antoine Louis Destutt De Tracy, 1754 - 1836)首先在《意识形态概论》(1804 - 1815)中使用的,指“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和发生规律的学说。后来拿破仑一世(1769 - 1821)在贬义上使用该词,把持不同政见的特拉西等人称作‘意识形态家’即空论家,意识形态一词就此带上了‘虚幻性’的含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意识形态’最早出现在《神圣家族》中,而具体阐述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2]通常我们会把这个概念简化,去掉它的模糊性成分,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莱温(William C. Levin)给出的定义:“意识形态是指用来解释世界如何运作以及被用来证明一群人追逐他们自己的利益有理的一系列观念。”^[3]这样解释虽然过于简单了,但毕竟好理解一些,其实,意识形态的问题很复杂,它有许多分类,如保守的、激进的等等,这里不再赘述。对这个概念的历史有了基本了解后,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当前它的意义和内涵,一般来说意识形态是指: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根本利益的体现。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思想上层建筑的部分,表现在哲学、宗教、政治法律思想、文学艺术等形式中。从词源学上讲,它来自希腊文 idea(思想或观念)和 logos(理论和理性),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意识形态概念,由于实证主义的影响,被规定为与科学、真理相区别的属于价值领域的精神。目前,在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概念多与政治密切相关,而政治意识形态主要是指:“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理论体系,由于统治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这就

[1]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2] 冯契:《哲学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9页。

[3] William C. Levin, *Sociological Ideas*, by Wadsworth, Inc. 3rd ed. 1991. p. 199.

决定了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在该社会中也居于统治地位,同时也就决定了它在整个政治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1]再来看一看科学主义概念的意义和内涵,据学者刘明根据权威的韦氏英语大词典考证:“科学主义(Scientism)是指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被用于包括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的理论观点,和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富有成果地被用来追求知识的信念。”^[2](和 Tom. Sorell 的定义基本相同,关于这一点在以后的文章中会有详细的介绍)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科学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概念在内涵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正如哲学家江天骥指出的那样:“人们用‘科学主义’一词不仅要贬损认识论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也要贬损本体论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因为自然主义者承认因果律可以说明一切自然、社会、文化现象和人的行动,简言之,一切都在科学说明的范围之内。”^[3]然而,只要我们仔细地考量一下科学主义观念的演化史,就会发现,科学主义最初只是一种侧重于科学方法论万能的思潮,据学者李醒民考证:“科学主义一词在英语世界出现于 1877 年。”^[4]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把科学主义作为一种运动提出来的,应该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努力结果。在这方面应当以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学说的提出为滥觞,伴随着实证主义的兴盛,科学主义观念日益越出科学的疆域,向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渗透,任何学科如果拒绝科学主义的渗透,就被指责为非科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科学主义在各个领域都达到了顶峰。随着 60 年代以来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学派的兴起,以及在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传播,标志着后现代文化的成熟,它拒绝承认科学主义的凌驾一切的霸权话语,主张消解一切具有特权的传统观念,尤其是随着 60、70 年代以来,科技的各种负面效应的揭露与显现,人们开始怀疑科学主义是否真的是拯救人类的灵丹妙药,科学主义与现代性是否真的具有直接的线性关系。80 年代以来,人们开始重新反思启蒙运动和现代性,以及科学主义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使得科学主义成了人们反思的对象。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科学主义在当前还是具有其他任何思潮所不具有的强大的渗透力,而且它已渗透到我们的思维方式中,并有人为地、加速地上升到意识形态的趋势,它可能带来的各种后果,都是无法准

[1] 石永义等:《现代政治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64 页。

[2] 刘明:《试论科学主义及科学主义批判》,《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 年第 5 期,第 20 - 27 页。

[3] 江天骥:《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哲学研究》1996 年第 11 期,第 51 - 59 页。

[4] 李醒民:《有关科学论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第 20 - 23 页。

确地预料的,而目前的研究往往忽视这种潜在的趋势,单纯的极端拒绝和全面接收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仔细地、审慎地分析科学主义被意识形态化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这应该是我们可以做的唯一选择。

二、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化后的危机与局限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科学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内涵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如果把科学主义内化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甚至上升为就是意识形态本身,我们称这种现象为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化。这种现象的最直接表现就是把科学主义政治化,把一种本是源于科学方法泛化的社会心理,硬性地与政治意识形态结合,而这本身就蕴涵了一种内在的矛盾,因为按照传统的看法,意识形态是非科学的,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的与非科学的界限被人为地消解了。由此引发的诸多困境,还没有得到仔细的研究,对此,我们主要从下面几点来分析,以此来说明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化后可能出现的危机与局限。

1. 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化后的文化多元性的断裂

我们知道,科学主义从本质上要求以实证的方法去检验和衡量一切,由于人类的文化是由多种元素构成的,人类学家泰勒(E. B. Tylor, 1832 - 1917)在1871年《原始文化》一书中,把文化定义为:“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习惯等在内的复合体。”^[1]在泰勒之后,文化人类学家林顿(R. Linton, 1893 - 1953)在他的《文化人类学入门》一书中把文化概括为“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由此可见,科学主义只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硬性地用科学主义这把“奥卡姆剃刀”去衡量和检验人类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无疑会把文化的宽广外延狭窄化和庸俗化,造成文化的不可逆转的断裂,因而,必然出现文化多样性形式的消失。从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明确地发现:“多样性表明还可能存在着其他的生活方式,我们没有只拴在我们自己的传统和对于人类本性欠思索的观点上,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学会欣赏其他形式的合理性,然后才会出现一种宽容、多元的文明。”^[2]正如加拿大政治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指出的那样:“认同差异,像自我选择一样,要求一个关于

[1] 沙莲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2] M·卡里瑟斯:《我们为什么有文化:阐释人类学和社会多样性》,陈丰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重要意义的视野,一个在此情形下共享的视野。”^[1]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也正是科学得以发展的源泉。综观科学史,各个民族文化差异的存在,造就了科学丰富的内涵,而且各个民族也都以自己文化的范式对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很难想象,如果人类只存在一种文化模式,今天的科学将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自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在人类的生存中日益取代中世纪时上帝的位置,而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这种思潮与科学主义不可避免地融合,正如学者肖巍指出的那样:“科学固然得益于实验技艺的经验论传统,但要建立严密可靠的知识体系必须依靠理性的力量。”^[2]至此,理性日益成为科学精神的本质要求,在这种新哲学的倡导下,侧重于经验的、实证的科学方法逐渐成为一种主导的思维方式,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科学的巨大发展,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以此为内涵的科学主义也就必然地获得了它的合法性存在。这个过程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成长是同步的,资本主义在短短的几百年内,创造了人类几千年未有的奇迹,无形中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西方中心论日益确立其合法的地位,人们也就形成了一种认识:以为孕育了现代科学精神的西方文化是最优秀的,并以此为准绳,得出的结论是所有其它的文化的存在都是不合理的,即使存在了也是落后的。这样一来在非中心文化的经济落后地区,科学主义也就愈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形成一种无形的高位势文化,因而愈发容易被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地位。在这种背景下,本位文化被无情地驱逐了,在传统文化和科学文化之间出现了内在的冲突,它造成的后果是在社会秩序中出现了社会的失范现象。因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共同体的成员不可避免地会意识到他们的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之间的差异和他们自己与其他共同体的那些成员之间的差异。”^[3]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真正的共同体不仅有一个历史和已经确立的制度,而且也是一个其成员认识到他们有着共同历史的团体。不能简单地把这里的共同体等同于科学哲学家库恩意义上的共同体。因为,这种共同体是一种文化的物资载体,有多种文化也就有多种共同体。由于科学主义的强大渗透力,许多边缘文化在这种态势下,纷纷瓦解,比如,我们今天的人类学家已经很难了解到未被同化的印第安土著人的文化了,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都广泛存在,而且这种文化消失的进程正在加快,如果一旦处于经济弱势地区的政治

[1]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2] 朱国宏、林尚立、张军:《中国社会变迁:反观与前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3] 贝思·辛格:《实用主义、权利和民主》,王守昌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

系统用制度安排的方式,把科学主义主动意识形态化,这种文化多元性的消失将变得不可避免。如果传统与科学的内在冲突解决不好,将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加剧,而且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也难以达到既定的目标。文化多样性的消失,造成的后果是科学生长的源泉枯竭了,科学主义的目标也无法实现或者产生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畸形文化,对此,许多学者都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那样:“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表象的世界的征服过程。这一进程的一个标志是,庞然大物(das Riesenhafte)到处并且以最不相同的形态和乔装显现出来。”^{〔1〕}在这里科学的世界图景被认为就是真实的生活世界,形式上的(可计算)合理性遮蔽了实质上内容丰富、神秘、灵性和诗意的东西逐渐淡出,人对自身存在状态和内心情感的需求以及对审美的渴望被彻底的遮蔽了,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马尔库塞所断言的“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人”。最终演变为多元文化被筹划为单一模式的科学主义文化。众所周知,意识形态具有形成社会凝聚力的功能,而科学主义本质上作为一种方法,被人为的提升到意识形态的地位,它同样面临无法实现承诺的困境,而无法起到多元文化原先具有的稳定社会、安排秩序的功能,这也反映了科学主义泛化后的危机与局限。但是,这只是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化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危机与局限,如果我们把范围再缩小一点的话,看看这种情形在一个空间界限比较明显的区域内的危机与局限,将使我们科学主义的泛化的后果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

2. 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化后的话语霸权

科学主义取得话语霸权的途径主要有两条:其一,科学主义借助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直接介入和使之制度化,从而形成一种制度依赖型话语霸权,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路径;其二,科学主义从科学研究本身出发,提出一系列的标准和规范,以此,构筑关于科学主义的宏大叙事,以至这些准则通过在实际中的应用,及诸多成就的取得,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常识和信念,渐渐地它就取得了通向真理的唯一道路的合法性判据,形成了福柯所谓的知识/权力的关系的霸权地位,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路径。由于,第一种方法是人类处于蒙昧时期的取得话语霸权的常用手法,如中世纪教会 against 宗教信条的解释与规定就是借助政治势力取得霸权地位的,这种方式常伴随着反抗与冲突,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时候,第一种方式已经不适用了。在新的形式下,话语霸权的取得往往先通过自下而上的过程,然后再通过自上而下方式给以加强,以至于这种意识形态化具有

〔1〕 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90-91页。

更大的隐蔽性和减少阻力的双重优势,这就要求如何从科学方法本身去寻找它的普适性,然后再用意识形态化固定下来,这就是科学主义在当前取得话语霸权的根本路径。

科学主义是如何取得普适性的呢?通过科学哲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这个过程是通过对科学判据问题的研究取得的。众所周知,科学的划界标准历来是科学哲学研究的热点,因为它事关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问题。从培根的归纳方法、笛卡儿的演绎方法,到20世纪初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稍后的以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他们的工作目的主要是完成科学的判据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多了,这里就不再赘述,只是需要说明的是,正经使科学主义思潮达到顶峰的应该是兴起于20世纪20、30年代的逻辑实证主义,以至于实证方法的应用与否成为一门学科是否科学的标准,这种思潮迅速蔓延到社会的所有角落,由此科学主义的理念渐渐积淀在人们的社会心理层面,为它的进一步提升创造了内在的条件。随着传统的形而上学以及宗教等由于无法被证实和检验,统统被斥之为非科学。科学主义已经取得了判决一切知识的话语霸权。但是,“尽管事实上许多科学主义的追随者宣称不信宗教,甚至敌视宗教,然而,科学主义定义它们自身的信念时并不总是可以科学地检验的,而且,它也必须像对宗教信念进行分类那样。许多原教旨主义基督徒认为:科学主义已经替代了基督教的位置成为了一种非官方的宗教。”^[1]这样一来,科学主义就已经上升到社会意识层面,已经具备了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这就加深了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霸权就转化为教条主义(Dogmatism),正如 Enver Halilovic 指出的那样:“为了达到真理、正当性和理解力,当一组原则、知识或方法被当作普遍的、唯一的起源以及唯一的知识形式和唯一的方法种类时,教条主义作为一种精神原则就变成了现实。”^[2]一旦科学主义成为一种教条,不可避免的造成极权和一元化,这样它相对其他话语就具有了霸权。它产生的后果是,“一旦你决定了那唯一‘真实’的宗教(通常是童年时拥有的)是非科学的,而且根据现代的理解力,因而那个信念是无价值的。这只是很短的一步就达到了宣称所有次一级的宗教、奇迹系统、心理

[1] Scientism, <http://www.gurus.com/dougdeb/Essays/Nextrel/content2.htm>

[2] Enver. Halilovic, *Feyerabend's Critique of Scientism*, Enrahonar 28, 1998, pp. 145 - 160.

技术甚至更不科学和荒唐的。”^[1]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主义像其他形式的教条主义一样,它通过与政治的结合变成了国家的意识形态。这样一来,对于科学的更远发展它就变成了一种不祥的征兆,因为它阻止了其它精神内容和存在的发展,如精神和理论的多元化。综上所述,从方法论的角度,我们探讨了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化后的诸多危机,那么,这种危机的实质是什么呢?即这种危机在更高层面上指涉了什么呢?也许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而国内学者大多对此缺乏关注。我们认为: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化后的危机与局限主要体现在存在两个方面的危险,其一,利用科学主义达到普遍规训的任务。众所周知,规训(Discipline)具有多重而又相关的含义:“包括学科、学术领域、课程、纪律、严格的训练、规范准则、戒律、约束以至熏陶等。”^[2]当把规训理解为学科时,它的含义直到最近都是完全正面的,但是我们要看到“此名称并未揭示知识是透过对知识生产者的规范或操控而生产的,也没有说明门徒训练会产生普遍接受的学科规训方法和真理。”^[3]在福柯的眼里,这种普遍的规训造就了驯顺的肉体,正是这种意义上的规训,造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人之死”,由于科学主义被人为地提升到意识形态化后,更是加剧了这种进程,在此意义上,普遍规训在存在的合法性上,取得了合理的根据,同时也孕育了单向度的社会存在的广泛基础,正如纪亚流所云:“科学常常是漫长的边界纷争史上的赢家”^[4];其二,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化后,加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建设。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学人出于种种原因,鲜有论述。根据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研究,他认为“不要把明显支持国家机器的实体,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同强制性国家机器混淆起来。”^[5]哪些机构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呢?阿尔都塞列举了八种:宗教的、教育的、家庭的、法律的、政治的、工会的、传播媒介的、文化的。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与强制性的国家机器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三点:只有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却有许多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强制性国家机器属于共有范畴,而后者属于私有范畴;强制性国家机器主要靠强制手段发挥作用,而后者主要靠意识形态发挥作用。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个问题在我国具有更为实际的文化渊源,我国

[1] Isaac. Bonewits, The Impact of Scientism on Competing Faiths, <http://www.neopagan.net/scientism.HTML>.

[2] 华勒斯坦等:《学科 知识 权利》,刘健之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2页。

[3] 华勒斯坦等:《学科 知识 权利》,刘健之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4页。

[4] 华勒斯坦等:《学科 知识 权利》,刘健之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3页。

[5] 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海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页。

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长久以来,意识形态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体现,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这个影响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因而,如果一旦某种思潮被人为上升到意识形态地步,就完全有可能导致历史的重演。当然,科学主义与儒术有着根本上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主义要比儒术更符合历史潮流,也具有更大的进步性,但是我们要看到,人类的理性是有边界的,这一点康德早已发现了。一旦,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化后很有可能造成理性的滥用。在这方面人类有过太多的惨痛教训,如作为科学的进化论、优生学等被人为的上升到意识形态后出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优劣论等,都对人类产生过重大的不良影响,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这种可能性不是变小了而是变得更具危险性。19世纪的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曾争论到:“所有的生活,包括教育都应该从科学发现中上一堂必不可少的课。在‘教育:智力的、道德的、自然的’一文中(1860)他坚持对‘什么知识是最有价值’的问题的回答,那就是科学研究所提供的知识。”稍后,他又说:“科学的价值不在于它可能提供更美好的世界,而在于通过这条路,科学能教给人类调整适应那不易于受人类工程影响的环境。”^[1]由此可见,自19世纪中叶以来,科学主义的观念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日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而与早先的科学话语产生了巨大的疏离感。以科学主义为名的意识形态话语日益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旋律,它导致了波朗尼所说的难言知识(tacit knowledge)的合法性的丧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可能走向多元化,至多只能是多样化。正如学者邵建指出的那样:“某一种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后,它和其它思想之间的平等关系也就消失了。‘因为’意识形态的知识运作本来就是用权力来支撑的,权力先于知识,知识是在迎合权力需要的基础上从而形成其话语。”^[2]在这种权力话语形成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同时也加强了这种话语的赖以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正是这种双向的互动,使科学主义成为科学精神的反动。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同意 Francis 所说的:“假设你考察一个社会并且从它内部移去所有与成就与真理的表达有关的机构和个人,那么这个社会还剩下值得研究的事情吗?或者,让我们从人类历史中移去它的哲学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圣徒和神话的故事,那个历史还剩下多少值得研究的事情呢?”因此,“我们必须恢复哲学、宗教和常识作为一种有用的知识,否则,我们将在科学主义的疾

[1] Spencer's Scientism, <http://zebu.uoregon.edu/js/glossary/scientism.html>.

[2] 邵建:《两种话语》,《方法》1999年第3期,第40-41页。

病中走向死亡。”^[1]对此,费耶阿本德的洞见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理性不再是指导其它传统的力量。它本身只是一种传统,它要求进入舞台中心的权利与任何其它传统同样多(或同样少)。作为一种传统,它谈不上好坏,它仅仅是一种传统。”^[2]

三、结 语

综上所述,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化后会造成许多危机与局限,尤其是将会导致文化多元性的消失,以及造成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产生两种文化的更大的裂痕和冲突,最为重要的是导致从整体上对现代性认同的危机(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述),这些损害是双向的,它在造成上述危机后,更使科学主义自身陷入一种困境:发展的衰竭。我们的研究旨在指出这些潜在的和显现的危机与局限,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反科学主义,尤其是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赞成科学主义成为主流的今天,我们理解这种愿望和心情,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实在是太缺乏科学主义的内涵了,因而加强这种内涵也就成了时下改造传统文化的一种举措,“五四”先贤们已经为之进行了可贵的努力,但是在这种努力中也包含着诸多的危机,矫枉过正的经历使我们在这个时刻必须保持一种批判式的警惕,这也符合科学精神的内涵。在当前全球范围内,存在两种反科学主义:“强反科学主义和弱反科学主义,弱反科学主义是指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被用到任何问题上的观点。”^[3]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这里仅仅是指应该,而不是必须,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硬要指责我们为反科学主义者,我们只承认自己是弱反科学主义者,因为我们也同样热爱科学精神,并且深知,中国的传统文化缺少这一课,这是我们必须为传统付出的代价。

(责任编辑:钟 和)

[1] Brother Francis, The Danger of Scientism, <http://www.catholicism.org/pages/scientism.htm>

[2] 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3] Robert Todd Carroll, Scientism, The Sceptics Dictionary. 2002. <http://skepdic.com>.